

角色与个性

[作者] 王逸舟

[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

[摘要] 本文从角色和个性的不同角度探讨人性在国际关系起到的复杂作用。作者提出,一般来说,角色在较发达国家起较大作用,个性在较不发达社会更有影响;不过,研究者同时应当注意到这一“定理”在适用不同条件时的多种形态。在许多场合,政治人能够超常发挥,超越角色的束缚;在另一些时候情况却正好相反。在研究政治人的个性时,类型学、政治心理学和病理学等学科的成果可以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关键词] 角色,个性,类型学,政治病理学,心理学

人的个性在什么环境和背景下会影响决策或发挥更大作用?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一般而言,经济、社会越发达的国家,“角色”的作用越大;在越不发达的国家,“个性”的影响力显得越显著。[1]在这里,“角色”通常指的是政治系统对个人的定位,也即“职务”对个人的要求或个人担任特定位置后应当履行的义务,如合法的地位、宪法赋予的权利、职业训练造成的习惯和行为方式;比如,在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对常备军和军人的一条成文或不成文的戒律是,军队一般情况下只履行国防即防范外敌的使命(某些灾难性的国内情况除外,如面临大地震、水灾和社会失控的局面),军人在服役期间绝不参政、不干政。角色一般是由角色承担者所在的组织、特别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的。在比较发达的国家,组织化和制度化程度较高,因为对个人担当的角色有比较明确的定位和说明,各种角色之间的分工相对也比较合理、有效,个人在履行职责时必须遵守角色应当遵守的规则,否则有可能遭到失去职位的下场。在不太发达的国家,社会组织多半是新建的,规模不大也谈不上完备,缺乏结构严密的政府机构和组织程序,也缺少对个人担任公职时应当怎样做的系统说明;在这种社会中,尤其在比较封闭的国家,领导者的个性变得比较重要,一方面是因为当权者很少受到舆论监督和利益团体的约束,另一方面是由于欠发达社会的领导人往往拥有特殊的历史遗产或搏斗经历。前者如非洲的许多部落社会里的酋长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军队领导人,他们在本部落、本国家的巨大权柄和威严,经常超出工业化国家普通人的想象。后者如乌干达前统治者阿明或伊拉克的萨达姆,只有具备非同凡响——不论用我们的眼光看是好是坏——的魅力、胆量 and 人格,他们方可从群雄争斗的乱象中脱颖而出,其权势历经沧桑而不衰。这种领导人多半有特殊的神话、魅力与才能。在较发达国家,制度化程度越高,或者说各种规范与建制越健全,个人对制度赋予的角色义务之履行越准确,不同人的个性所起的相对作用就越有限,社会、民族和国家所遭受的领袖可能之失误的打击就越小;事例之一是,尼克松政治行为的不轨,或者克林顿个人品端的缺陷,象世人所见到的那样,并没有造成美国社会和经济的剧烈震荡和严重损失(有时甚至“坏事变好事”,推动了政治制度及程序的进一步改进)。在这里,注意的重心是制度,是角色和程序,或者是制度化、角色化和程序化的个人。与此成为鲜明对照的是,在欠发达社会,领导者个人魅力的光环越耀眼,他的所作所为产生的效果越大,实际上他的背后包含着愈发的脆弱和不稳定,因为这时整个社会、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仅系于一人之身。“完全仰仗某一个人的政治体制,是最简单的政治体制。同时,这种体制也是最不稳定的。”[2]典型事例还可见古代中国的各个篇章,在那里,充斥着圣王贤相(如“包青天”)造福芸芸众生的传说,同样充斥着昏君恶治导致社稷失序、百姓遭殃的悲剧;政权的更迭与君主的替代,带来的是政治的失序与社会的混乱。人们在这里关心的焦点,是领袖人物品性的好坏,在于个人魅力或能力的大小,相形之下,角色、程序和制度显得比较次要。总结这些经验教训之后,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指出:“复杂社会的政治共

同体，依赖于该社会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的力量。而这种力量的强弱，又取决于这些组织和程序获得支持的广度及其制度化的程序。所谓广度，指的是这些政治组织和程序所能包容社会活动的范围。如果仅由少数上层集团包办各种政治组织并依据一套固定的程序行事，所谓广度就是有限的。相反，如果大部分人口都加入政治组织遵循政治程序行事，其广度就很可观了。制度就是稳定的、受尊重的和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组织和程序与其制度化水平成正比”；“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任何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程度都可根据它的那些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部协调性来衡量。”[3]在价值评判层次上，多数政治学家们总是给制度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以更高的估价。

不过，我们在理解这一定理时，不应当把它简单化、绝对化，迷失探索人性与政治之关系问题时应当遵循的方向。它只是较发达区域与较不发达区域的比较而言，或者说，仅仅就“角色”和“个性”两个范畴的区别性而言，但它并未说明（或者说并未排除）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内角色与个性之不同作用的多样性。显而易见，即便在发达国家，领导人个性、价值观、人格、政治风格、智力和以往经历的不同，同样会造成重大区别；在许多时候和情况下，个人的思考与努力亦能够超越角色、程度和制度施加的限制，并使后者具有个人独有的风格与特色，一些具有特别强大支配力和灵活手腕的政治家甚至使自己凌驾议会制度和其他制衡手段之上，形成“民主体制下的独裁方式”。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A. Gramsci），曾经把这种现象称作“恺撒主义”。[4]即使达不到“恺撒主义”的程度，一些西方政治家凭借各种方式超越制度约束的现象却屡见不鲜。拿二战后历任美国总统看，有些属于比较“自我中心”式的人物，有强烈的个性，敢于创新或进行政治冒险，会打破惯例的约束，有一些出人意料的“大手笔”和举动；这方面，我们可以列举罗斯福及其“新政”、尼克松及其打开中国大门的果敢举止。战后的多数总统属于循规蹈矩的类型，比如处于罗斯福巨大成就阴影下的杜鲁门，或者在里根突然遇刺情况下仓促就任最高职务的福特。这两类总统之间的差别及他们造成的不同后果，在许多人看来，很可能不亚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内部领袖人物的个性差别及其效果差别。“角色”的发挥与否，常常与个人的才智与努力分不开；再严格的程序和制度，也不可能不给个人留有发挥的余地，因此格外有创造力或自我中心式的人物，总能想他人所不敢想、做他人所不敢做。基辛格在评价他心目中的伟人、势力均衡思想的最早实践家、19世纪中叶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时，指出：俾斯麦掌权期间，各种的难题都靠他以高明灵活的外交手腕解决。但久而久之他种种复杂的安排却注定要失败。“铁血宰相无法将其政策制度化，使德国被迫落入左支右绌的外交困境中，到最后唯有靠武器竞赛，继而发动战争来获得解脱”；“俾斯麦为德国设计的体制，正包含了他个人的种种癖性。在他的继任者当中，没有一个人拥有这种技巧，更别提有胆量这么做了。结果德国民主制度培养出来的国家主义，逐渐变得好战排外；同时，不能担负责任的民主成为无效的体制。”[5]基辛格本人，便是一位在不违背角色定位的前提下使其发挥超常作用的大师，他在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但不是国务卿的时候，使后者成为前者的陪衬；但当他也成为国务卿的时候，又使国务院成为真正发号施令的地方。反过来讲，即使在欠发达国家，在那些制度化程度不太高或角色定位比较模糊的地方，领导人的个性也完全可能淹没在官僚主义的程序和文牍大海里而毫无显示，有限的政治制度化与有限的个性文化（或者，不妨称“不太鼓励个性的文化”）杂交在一起，往往特别令那些有创造力、有个性的改革派政治家沮丧，并且构成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特色”之一。此外，角色及政治系统虽然分化不够，但在许多欠发达国家，有限的角色规则往往格外突出和有力，致使担纲角色的人无法超越现有的限制。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力精英“中层”（不光指政治，同样包括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这种现象显得特别突出。拿中国目前情况而言，众所周知，普遍存在的一个批评是，很多官僚主义严重的政府机构及其官员，奉行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工作哲学，但凡“红头文件”没有宣示但有难度的事情，便尽量采取打“太极拳”的拖延态度。我们在分析角色与个

性在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的作用差异时，应当注意这些情况的复杂性与特殊性，避免“大而化之”或“一言弊之”的简单化做法。

“角色”因素与“个性”因素，均与个人行为不可分割，但从分类学的角度看它们内容差别很大。比如，角色更多取决于职位的规则和惯例，而个性多半与于本人的经历与成长环境有关，甚至直接与个人的心理和生理相联系。任何一项决策，都是个人与机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调整的结果，或者说，“是社会过程与半机械过程的综合”。[6]从社会过程来解释，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行为，是一系列的定价和讨价还价的结果。纵向地观察存在许多层次，从中央领导到地方官员，从中央部委的部长到局长、处长到地方城市的市长、副市长及其各级下属；横向看则存在许多相互制约的部门与单位，有政府、议会、军方、经贸口、外交口、宣传口、纪检口等等，它们都有各自的当家人和规矩，都有各自站得住脚的理由与局部利益，很少有一家说了算、旁人不存在意见或想法的情形。每个层次每个人都以理性的方式行事，选择自己认为最有利的结果作为目标，然后拿它去参加“游戏过程”。最终的决策，只能是多方博弈的结果，是恩格斯所说的“平等四边形的合力”。从机械过程来说，决策者把过去的决定，自己的前任、常规、政府角色当成一种确定的参照物，这就是机械的“标准操作程序”。通常情况下，各部门各单位都对过去的行为有可供查找的档案记录，对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的问题有自己的规定和说明。按照“帕森斯定律”，官僚机构越大，这些规定就越多越复杂，而且容易倾向于保守和自我服务，很少有创新，它们减少世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办法之一就是墨守成规，“按既定方针办”。无怪乎人们说，官僚主义容易扼杀个性。“角色取决于职位”这句话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它可能是指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在同一个岗位上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也可能意味着，同一个人不同的岗位上由于角色的规定性能够发挥完全不同的作用。这方面，外国中国一概如此。“即便是同一个人，随着其地位、社会角色的改变，也有可能立场、观点上发生变化。有名者如哈佛大学的国际政治学家、‘相互依存’学说的创立者之一奈伊，前些年他当教授时看上去‘国际主义’的成分比较多，近年受聘担任美国国防部部长助理后，所作所为时时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模样。”[7]补充一句：在1996年奈伊教授回到哈佛以后，立即恢复了学者自由自在、品头论足的样子。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在尼克松政府中担任预算管理办公室主任时，因主张猛砍政府各部门经费而获得了“比刀子还锋利”的绰号；但他在里根政府中担任国防部长时，又不断要求国会增加军费开支，并且使美国防开支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角色决定于职务的情况不止存在于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很多地方，我们看到，过去一些党的干部在担任政府部门领导人时，并不注意人大和政协的监督作用，但近年来随着党委第一把手担任各级地方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职务过程的加快，过去不受重视的人大现在比过去更加活跃。这也是一种个性发挥，但它属于在角色定位的范围内的发挥，与前面讲的制度化不健全情况下的个人超凡作用是不一样的。

类型学的分析对于我们看待个人与角色作用的问题是有帮助的。许多研究成果都证明，决策者表现的权力欲越强，他的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就越具有创新性（有时表现为侵略性）；例如，肯尼迪和尼克松这方面有着超乎常人的权力追求，他们显然比卡特和福特更有进取性、冒险性，各自政府的重大政策调整也更难捉摸。决策者个人的认知能力——指从不同角度观察分析事物的能力——越复杂越强大，他的政府就越具有合作性，谈判解决问题的潜力就越大。一些落后的非洲部落社会之间所以动辄兵戎相见，其原因概出于此。决策者的个性特点，如愿意承担巨大风险的倾向，对模棱两可和不确定性的容忍态度，智力水平和创造精神，自尊心和支配力，顺从性或权力欲望，事业心和私人交往的需要等等，会从不同侧面和领域影响他决策的方式和取舍的态度。政治心理学教会我们，在制度规章或角色定位看上去十分机械的逻辑后面，总有人身影、声音或“力比多”显现。事实上，领导人的决策往往反映他们的个性、心理甚至生理，个性总是深深植根于他们的早年经历或心灵影像。有的研究者

通过仔细探索发现，一战时期美国威尔逊总统处理问题的方法，如涉及权力的问题以及对他人的控制，包括他不愿与政敌妥协的性格，可能都与他童年时代与父亲的关系有关。威尔逊控制别人的欲望，产生于他从小对父亲的竞争与敌意。“政治权力对他来说，有某种补偿的意义，是一种恢复童年时代被践踏的自尊的手段。”[8]对美国当代著名外交家和国际政治学家基辛格的分析也表明，这位德国移民童年时代在纳粹野蛮统治下所受到的创伤，是影响他个性和风格的主要原因，由此而产生的内心矛盾促使他寻求外部世界的有序性和平衡性，推崇强人政治（如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治国方略），反对任何带有幻想色彩的建议。同样，对前总统里根的分析证明，这位出身卑微低下却不甘沉沦的人，从童年起就竭尽全力克服生活中碰到的各种困难，始终控制感情、保持理智，从而在个人事业不断取得成功；40年代后期他所以在政治上转向右翼，是“为适应个人和政治危机而采取的措施。在他个人生活和私生活遇到挫折时，他采取反对共产主义策略，达到了某种自我保护和社会调整的作用。”[9]每个人都会同意下述判断：少年得志、一帆风顺的人，往往对人生比较乐观，对顺利进展的前景有更高的预期；从小吃苦、出身低下的人，多半谨言慎行，遇到问题时对困难的一面有更多的思想准备。对很多政治家的研究也可以发现，他们平生第一次的、独立的胜利——不管旁人看来胜利大小，比如中学时竞选学生会干部的结果，或者小学一次运动会的成绩，或者更小时面对父母给予的奖惩测试——会给取得这种成功的政治家以极大鼓舞，就象一个一旦被启动便加速运转的动力机，给他日后的努力及雄心以极大的鼓励推动，同时给他后来的从政风格打上深深的印记，譬如说，很可能将决定这个人对于日后工作的态度是“主动的”还是“他动的”，平时是乐见挑战还是厌恶麻烦，影响与他人共事、合作和处理问题的方式。

按道理说，思维、心理或行为异常的人，是不大可能占据领导职位、尤其是最高层的职位的，尤其在比较发达的国家。但是，从历史经验看，在异常剧烈和突发的社会和政治动乱期间，不能排除个性异常的人占据高位甚至掌握整个政权的情况出现，因为这时通常的领导人按通常的程序已无法应付异常的麻烦与问题。最典型的事例是，希特勒在德国二、三十年代通货膨胀严重、失业率猛增、旧政府用传统手段不能奏效之时，凭借蛊惑人心的宣传和异于常轨的措施，获得了民众的信任并借机上台。其实，在许多国家危机期间，都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只不过没有象“希特勒现象”那么典型，或者结果象那么糟糕罢了。此外，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是，领导者执掌大权的时间过长，也容易对执政者造成巨大的精神和生理压力，甚至使人的行为和心理变得异常，并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决策和言行。这方面，对政治领袖人物所做的大量病理学追踪分析充分做了证明。担任过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位总统下的美国国务卿的腊斯克先生，曾经仔细研究过他参加的首脑会议时那些“大人物”的行为和身体状况。他注意到，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们利用受情绪冲动和高血压控制的手，从中获得巨大的好处。他说他看到的患病的领导人实在太多了，这些位高权重的人尽管有病却仍然肩负重任；“如果这些政治家身体健康，某些决定可能会不同。”[10]《病夫治国》一书的作者指出，同一位丘吉尔，在一战时是何等的审慎周密，注意到某些英国元帅因患有病状，其精神和身体情况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和荣誉，也直接影响了国家安全”。然而后来他却看不到自己的衰弱，忘记了过去说过的正确观点，晚年出了许多“状况”。阿考斯和朗契尼克在分析了当代28位头等重要性的世界政治领袖的病理和心理之后，指出：这些人“对创造世界历史作出了贡献，但他们也几乎都在其生命的某个艰难时刻使国家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某些人甚至将国家拖进可怕的灾难之中。”如果不是这些人物的贡献与失误，包括他们身体的特殊状况如果不是实际已经发生的那样，“我们所见到的许多历史事件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样子。”[11]在当代国际政治中，这种现象可以说不胜枚举。戴高乐是一个正面事例，他在临近垂暮之年及时引退，为较年轻的政治家让开了位置。叶利钦在经历了一系列个人身体的麻烦之后，终于在20世纪的最后一天作出决定，将总统职权交给比他年轻得多、健康状况也好得多的普京，不失为明智的决定。而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却是反面的例子：80年代前期他

已知自己身患绝症，却不让私人医生告诉任何别人，包括最高决策层的其他要员，仍旧照惯例行使国家元首的各项职责，使法国这个具有世界影响的欧洲发达国家和“核俱乐部”重要成员长时间处于一个癌症患者的统治之下。我们中国人对此也有深刻的体会。在毛泽东晚年，虽然他的身体状况极差，却始终没有意愿让出权力，也未能够建立有效的制度移交哪怕一部分最重要的权力，相反，他依靠自己的亲属或身边工作人员，不时向政治局传达各种“最高指示”，左右整个政治局势，造成国家政治生活的严重失序。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深刻汲取了这一教训，90年代初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明了为什么自己要在威望处于鼎盛之时把最高权力转移给新的领导集体的原因。他说：“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这样？这不是因为我谦虚或别的什么。现在看起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国际上好多国家把对华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者死去了上面。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出了事就不可收拾”；“现在我八十五岁了，到了这个年龄，该有自觉性。”[12]不论一般人同意与否、喜欢与否，世界政治的历史篇章，不论是悲观或喜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重要人物的思想言行书写下的。

最后我想说的一点是，角色与个性的发挥，在很多情况下，还决定于信息条件的充分与否。信息条件的不充分，决策者作为个人在获得、筛选和运用信息时必然面对的各种困难和麻烦，经常是难于避免的，或者说，是一种“给定”的东西。在这里，“信息”指的是一组系列的、内容广泛的、正在发出的信号过程。一个人，不管是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者还是循规蹈矩的官僚制成员，不管是高官还是百姓，在做出自己的各种决定时，首先必须对环境提供的信息进行筛选和分析，但问题是他（们）永远无法掌握、处理和理解所有的信息。情况通常是，人对它能够得到的或容易得到的信息进行处理，去除某些信息，对另一些信息略作变动，使它们不致于影响现有的看法和信念，同时对其它的信息只需迅速浏览一下即丢弃。在此过程中，制度化的组织方式、提供信息的渠道和个人的心理接受过程都是十分重要的。对于个人来说，他要运用自己已有的知识，包括经验中已经具有的意识形态，来过滤信息、选择它们，看看哪些重要哪些次要；个人在某个组织中的职位和角色，可能对信息的过滤和选择产生重要影响。一旦信息选定，决策实际上也被圈定了范围。外部世界对决策产生反馈，即出现行动结果的信息，这样决策者有机会重新评估自己的决定及其背后的观念，必要时他可能对它们做出变动。以上讲的仅仅是个人层面。从组织层面看，则会出现正确引导信息传递或有意输送错误信息误导他人的多种可能。比如，制度机构本能地会运用信息来保卫自己的利益，只向别人提供对本组织有利的信息，让决策者看到的只是制度机构所希望让他看到的方面和内容；同样，制度在提供各种选项时，可能为决策者提供一份选择好的“菜单”，其中每一项都会有利于扩大制度结构和力量；制度机构还会在自身利益基础上执行决定，它会延误、改变甚至拒不执行决策者的命令（虽然可能是以“柔软、温和”的方式）。想想看，单从信息角度考虑，这中间就含有多么巨大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偶然性，含有多少容易导致人出现错误判断的可能！读者可能看过美国电影《摩羯星一号》，那部电影叙说了个可怕的故事：美国太空总署在一次太空船发射失利之后，为掩盖事实真相、继续争取政府预算经费，而暗杀太空员和向公众谎报“升空顺利”的消息。我们也多次听到过由于信息失真而出现重大隐患的事情，比如，美国空军在越战期间为夸大轰炸的效果，在发布新闻时采用的是不可信的飞行员的口头汇报，而不采纳卫星拍摄的照片；肯尼迪政府时期，由于美英两国政府在信息沟通上出了差错，对于空中发射导弹问题出现分歧，几乎导致两国关系破裂；在科索沃战争期间，北约发言人有意捏造和渲染南斯拉夫塞族军人“屠杀阿族平民”的耸人听闻的故事，与此同时却竭力缩小所谓“误炸”给平民和民用设施造成的损害，以骗取西方公众和世界舆论对北约轰炸行动的支持。信息失真或有意被歪曲的事情，几乎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可以见到，而其严重影响差不多在任何场合都被有意缩小甚至全盘封杀。

国际政治的现实并不都象教科书所说,它还充斥着许多拿不上桌面的故事。国际政治是人的事务,人的一切特点它都具有。我们不应当让神话迷惑自己。

参考文献

- [1] 在众多分析政治角色和政治领导人个性的专著中,除前面已提到的著作外,读者可以参见阿尔蒙德和鲍威尔合著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第 1 版),伊斯顿的《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版)和亨廷顿的《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 1989 年版)等。
- [2] 亨廷顿,前引书,第 17 页。
- [3] 亨廷顿,前引书,第 11 - 12 页。
- [4] 葛兰西:《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第 1 版,第 167 页。
- [5] 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 1997 年第 1 版,第 114 - 115 页。
- [6] 路塞特和斯达(B. Russett and H. Starr): World Politics, The Menu for Choice, Fourth Edition, 1995 by W. Freeman and Company. 中文版可参见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95 年第 1 版,第 233 - 247 页。
- [7] 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1 版,第 4 页。
- [8] 《威尔逊和上校家族:个性研究》,纽约 1964 年版,转引自路塞特前引书第 254 页。
- [9] 路塞特,前引书,第 256 - 257 页。
- [10] 阿考斯等:《病夫治国》,新华出版社 1981 年第 1 版;《病夫治国》(续集),新华出版社 1992 年第 1 版。
- [11] 《病夫治国》,出处同前,第 3 - 5 页。
- [12] “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10 - 311 页,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1 版。

<http://www.pssw.net/essays.asp?id=349>